

# 第一章 先秦时期云南的原始人和原始族群

##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云南的土著原始人

### 一、概述

云南是我国境内古人类发源地之一。在距今 1500 或 1400 万年前到 350 或 300 万年期间，腊玛古猿曾经生活在我们的地球上，它们是从猿到人的过渡性生物，属于人类的直系祖先，能吃植物也能吃肉，会使用天然的工具，被称为正在形成中的人。1956 年至 1957 年和 1980 年至 1982 年地质工作者和云南省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先后在开远市小龙潭煤矿中发现 25 枚古猿牙齿。根据其它地点众多古猿化石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将开远小龙潭的这批化石标本所属时代定为晚中新世，分属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腊玛古猿标本属于腊玛古猿的早期原始类型。1957 年 5 月，禄丰县文化馆王正举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在禄丰县石灰坝褐煤中发现了禄丰古猿化石。1975 年至 1981 年，云南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石灰坝进行了 9 次联合发掘，共获得 1060 枚牙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3 具腊玛古猿头骨。目前，世界上发现腊玛古猿化石标本的国家有中国（云南的开远、禄丰、元谋）、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希腊、匈牙利、肯尼亚和尼泊尔等 8 个国

家。而腊玛古猿化石标本最集中、数量最多，又是唯一发现头骨的国家是中国。因此，禄丰古猿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1986年10月至1987年3月，又在元谋县竹棚——小河地区发现了距今约300万年的元谋蝴蝶腊玛古猿和距今约250万年的东方人。至此，云南开远、禄丰、元谋发现的腊玛古猿已成为一个发展进化系列，即开远小龙潭腊玛古猿（1400万年前）——→禄丰腊玛古猿（800万年前）——→元谋蝴蝶腊玛古猿（300万年前）——→东方人（250万年前）。目前元谋县竹棚——→小河地区的蝴蝶腊玛古猿和东方人化石正在深入研究之中。假如其年代判断基本正确的话，则东方人将成为世界上最早已知原始人类之一。如果说东方人尚未确定其是猿还是人的话，那么，元谋人则是举世公认的原始人，他们已走完了由猿到人的漫长道路，进入了人类世界。

## 二、元谋人

1965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钱方、浦庆余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后山上发现了元谋人化石，化石是一个成年男性的左、右上内侧的两颗门牙。与北京人相比，元谋人的门齿大而粗糙，呈铲形状，基本与北京人相近但更具有原始性。经古地磁测定，生存年代约距今170万年前，早于蓝田人，北京人。后来又在牙齿化石出土的地方，出土了7件打制的石器，并在同一地区内的地表采集到石器10件。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碳屑，这些碳屑散布在上下厚约3米的地层中，与碳屑相并存的还有几块骨头，经鉴定认为大约是火烧过的，这一切表明可能是元谋人用火的遗迹。元谋人化石的发现，把我国发现最早人类化石的年代推前了一百万年，我国的历史也将从元谋人开始写起，同时他们又是今天云南已知

的最早的原始人，因而云南民族发展史亦当从这儿写起。

### 三、昭通人

1982年昭通市文化馆文物普查时在昭通城北十多公里的过山洞内出土了一枚人牙化石，学术上命名为“昭通人”。经过专家鉴定为距今五万年的“新人”化石，是我省首次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至今虽无更详细确切的考古材料证明，但可以认为“昭通人”是元谋人后裔。现在的川西、川西南、滇中、滇东北是地质时代所谓滇康古陆，这里是人类进化最理想的场所，迄今发现的元谋人便是在滇康古陆上完成进化，而“昭通人”又是生活在元谋人之后；“西畴人”、“丽江人”、“昆明人”等晚期智人之前的早期智人。可以设想，元谋人在元谋盆地停留很久之后，必然会在生齿日繁时向四方扩散。大江大河自古便是人类移动的天然走廊，所以，他们扩散的线路便是循金沙江或溯流而上或顺流而下，沿着河谷台地流动。这些已经日益增多的人群，我们姑且称之为滇康古陆原始人群，他们中的一支沿着金沙江而下，最终寻找到了适宜他们生存的滇东北千顷池地区即今天的昭通，而见称为“昭通人”。

### 四、西畴人

1965年在云南省西畴县仙人洞洞穴遗址中首次发现了人类文化遗物，1972年又进行了清理和发掘。这些发掘工作主要由古脊所、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工学院地质系和湖北省博物馆组成的滇东南考察队主持进行。共发现5枚牙齿化石，包括右下第二乳白齿一枚，右下犬齿两枚，右下第一前臼齿一枚，右下第一臼齿一枚。五枚牙齿约属两个个体。西畴人牙化石的形态特征，尺寸大小、特别是其中右下第一或第二臼齿的咬合面具有“十”字形结构，牙齿的形态特征和长宽指数都在

现代人的变异范围内。

### 五、丽江人

丽江人的化石标本和旧石器从 50 年代至 70 年代屡有发现。1956 年春，丽江木家桥漾弓江修人工渠时发现了晚期智人的 3 根股骨化石；1963 年发现 6 件旧石器；1964 年春 张兴永先生又在漾弓江左岸加宽工程工地中收集到晚期智人头骨一个，头骨属一个少年女性，其颜面上扁平程度、最小宽额等，都表现出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总的来看，与现代人十分接近，没有明显的差异。

### 六、昆明人

1977 年 4 月，昆明市呈贡县文化馆的胡绍锦在大渔公社三线水龙潭发现了两枚晚期智人的牙齿化石。属一个中年个体的两枚牙齿。在此之前，胡绍锦曾在同一地区有洞裂隙堆积物中或地表找到若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物，说明了昆明人是在旧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洞穴中还发现了 10 余种哺乳动物化石，除中国犀牛和鬣狗已绝灭外，其余都是现生种，表明昆明人生活的时代比西畴人和丽江要晚。这是昆明地区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标本，它为研究云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化石智人和昆明地区史前史增加了新材料。

截至 1983 年 5 月，昆明人的化石已发掘近百件之多，其使用的石器达 3000 余件，昆明人正是用这些粗放的石头工具，创造了滇池区域的原始文化，谱写了昆明地区史前史上人们共同体的第一章。

以上这些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表明云南在远古时期就是人类劳作生活繁衍的地方，他们是云南已知的最早的土著先民。

## 第二节 外来原始族群与土著原始人相融合而产生的云南原始族群

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各地遍布着许多氏族、部落群体，而且各群体之间有着频繁的迁徙对流。因而云南境内也存在着许多外来民族群体与土著原始人相融合而产生的不同于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的新民族群体。由于无文字记载，所以本时期他们的发展情况只能从考古材料中发现一些端倪。据云南考古学界的研究，认为本时期云南各民族群体所创造的新石器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滇池区域的晋宁石寨山类型、洱海地区的白羊村类型、龙川江流域的元谋大墩子类型、滇东北地区的闸心场类型、澜沧江中上游地区的忙怀类型、滇东南地区的小河洞类型、滇西北地区的戈登村类型。

上述不同的文化类型表现了云南新石器时代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即不同的类型，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特征，说明了从新石器时代起，云南就有着众多的原始族群分布。值得再次强调的是，这些文化类型都是外来民族群体与当地土著融合后共同创造的，那种只看到本时期云南只有氏羌、百越、百濮而不言与云南土著相融合的观点是片面的。如果说只存在三大族群，那么旧石器时代便存在的元谋人、昭通人、西畴人、丽江人、昆明人到哪里去了呢？显然是发展程度较低的原始土著与外来的民族群体发生了融合，对这些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氏羌、百越是我国历史上发展水平较高的两大族群，当他们带着比云南土著更为先进的文化进入云南后，势必影响着土著文

化的发展，最后还有可能取而代之，这也就是为什么云南土著文化无更多历史遗迹的原因所在，而表现为鲜明的外来文化色彩。

### 一、属于氏羌系统的原始族群。

氏羌是生活在西北的一个古代民族群体，大约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一部分沿着横断山脉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及雅砻江流域的河谷通道南下，这种迁徙活动愈往后愈频繁。这种历史情况可以在岷江、金沙江、大渡河及雅砻江流域的石棺文化中看到。石棺墓中所出土的陶双耳罐、单耳罐、三耳罐、高领罐均带有强烈的西北高原的甘青原始文化色彩，而在更南部的云南剑川沙溪鳌凤山青铜时代墓葬群中，也盛行单耳、双耳、高领陶罐，还有与西北地区齐家文化相似的所谓“安佛拉式”双耳罐，这说明了氏羌民族群体上至战国下至汉代向滇西北的迁徙是连绵不断的。由于他们文化先进，人数众多，所以涵盖了当地土著文化。

证诸文献，我国西南各省也是氏羌活动的地区之一。《史记·五帝本纪》载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隐注：“言帝子为诸侯，降居江水、若水。”又引《水经注》曰：“水出旄牛缴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过邛都，又东北至朱提县（今昭通市）为庐江水。”文中所言青阳、昌意活动的江水、若水即今天的金沙江、雅砻江一带，更东延至今昭通地区以北，这些记载与云南考古材料中所见的氏羌文化分布是大致吻合的。

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材料看，居住在滇西北以及云南其它地区的一些现代民族的传说、民俗中，也可以找到大量古

氏羌民族群体有关的历史痕迹。如普米族传说他们的祖先早前居住在甘肃、青海一带，后来沿着横断山脉南迁。纳西族的人死后，举行宗教仪式时，由东巴念送魂经送死者的灵魂到祖先居住的地方，方向是往北送，送过金沙江后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同时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一个叫“多弥”的地方迁徙而来的。据纳西族研究者考证，“多弥”即今天青海玉树州通天河一带。

## 二、属于百越系统的原始族群

百越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的，分布在中国南方及中南半岛的一个古老族群。从历史上看，越人中的先进部分曾经在公元前五世纪时发展起来，在今浙江省一带建立了越国。公元前 355 年，越国被楚国兼并，秦统一全国时，原越国境内的越人，便逐渐与中原地区的人们融合，成为汉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仍然聚居或散居在两广、滇黔、中南半岛的部分，由于部落众多、不相统属，被史家称为“百越”。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在先秦时代，百越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铤。以上两种石器在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遗址中都有出土，器形和制作方法也与其它地方出土的基本相同。云南的百越文化遗物，大多分布在滇池区域及文山、红河、西双版纳、临沧、德宏等地，滇东北地区也有发现。滇池地区发现的有肩石斧数量较少，和广西左、右江流域出土的有肩石斧相似，很可能是从广西传入的，而滇池地区有段石铤的数量却很多，江川头嘴山、安宁王家滩、昆明王家屯、晋宁石寨山等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均有出土。如果将物和人联系起来，那么先秦时期上述地区已经有百越民族群体的人进入云南与当地土著融合。从现实来看，除滇池地区外，文山、红河、西双版纳、临沧、德宏都是百越后裔壮、傣民族的

主要聚居区。

从考古文化看，滇池地区主要是百越文化为主，但后来怎么不见有越人呢？对此，张增琪先生认为：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分布滇西的昆明族以洱海区域为中心，向外扩张，其中向东发展的一支，经现在的弥渡、祥云、姚安等地向东发展，约在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初，昆明族已接近滇池地区，正当滇西地区昆明族大规模涌向滇池地区时，僰人也从滇东北南下，最终导致了滇池地区越人的南迁，大部分向元江以南迁，少部分散居沿线，今澄江、玉溪、新平、元江等地仍有傣族，便是南迁越人的后裔。

### 三、属于百濮系统的原始族群

古代云南还居住着许多称为百濮的原始族群，据《逸周书·王会解》载说商朝初年濮人便就向商朝贡献犀、象、短狗等。到周朝时，濮人又向周贡丹沙，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今云南南部地区仍有濮人居住，被称为百濮。从各方面来看，濮人是孟高棉系统的原始民族群体。在居住区域上，百濮往往和部分百越交错杂处，有些百越因此也称为濮。因为澜沧江上游为氏羌原始族群分布区，下游（指中国境内的西双版纳这一段）为百越分布区，中游为百濮分布区，而中下游交接处必有二者杂居。《逸周书》所指献短狗的百濮，便是澜沧江中游的濮人，直到明清时仍规定顺宁府“蒲蛮”以短狗为贡。联系以后的历史来看，商代的百濮、西汉的苞满、闽濮，明清的蒲蛮应是一脉相承，是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布朗、佤、德昂等族的先民。

综上所述，远在旧石器时代，云南境内就有元谋人、昭通人、西畴人、丽江人、昆明人生活繁衍着。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迁徙流动进入云南的民族群体与土著融合，云南境内已经

是一个有众多民族群体分布的杂居区。一般来说，分布在滇西北的氏羌原始民族群体是分别发展为近代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的核心；分布在滇东南、滇南、滇西南的百越原始民族群体是分别发展为近代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等民族的核心；属于百濮（孟高棉）系统的原始民族群体，是发展为近代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三族的核心。

### 第三节 云南民族与周边民族及 中原文化的交流

#### 一、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联系

在旧石器时代，云南境内的原始居民，已经与祖国其它地区的原始居民有着一些文化上的共同因素，在文化上既有创造，又互有一定联系。具体表现为云南旧石器与其它地区一样以石片石器为主。第二次加工较少，砾石的表皮仍然保存，一般只就破裂面加以加工。

新石器时代，云南各地新石器文化中各有自己的特点，但仍和祖国其它地区新石器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滇中、滇东北、滇南新石器文化中发现了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文化中的有肩石斧；滇西、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中发现了一种半月形双孔石刀，又与内地的龙山文化中的石刀近似。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尽管由于云南境内高山峡谷，河流湍急，远古居民隔离分散，但并非象过去人们所想象那样与世隔绝，“自古未尝与通中国”。云南历史不是孤立发展的，新石时代晚期，还与华夏民族有过密切的接触联系。据《尚书·牧誓》说：“时甲子

味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鬻、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文中所说到的濮人便有一部分在云南境内。《逸周书·伊尹朝献》载：“……产里，或以为今天西双版纳，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毒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这些贡献之物大都出现在南方，特别是短狗（即小种狗），解放初佤族仍将它作为奉献的珍贵之物，当年解放军进阿佤山时，佤族群众便献过短狗。

## 二、青铜时代的经济联系

几十年来对云南青铜文化的研究表明，云南民族青铜文化是中华民族青铜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文物已经表明当时的人们已处于铜石并用时代。

1979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在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的指导下，用现代实验方法对这些青铜器进行了研究，发现“妇好”墓中部分青铜器的矿料不是产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某地（张增琪先生估计为东川一带）。这就证明了早在3200年前云南的铜矿资源就已经被开发利用了”。中国科技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研究结论与云南剑川海门口的实际不谋而合。

众所周知，青铜文明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是要有铜和锡，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远在汉代，今天云南的澄江、江川、弥勒、蒙自、个旧等地就已出产铜、锡；《后汉书·西南夷传》也记：“哀牢夷出铜、铁、铅、锡……。”此外，作为云南与内地交通孔道的滇东北也大量产铜，朱提堂狼洗便是例证。既然云南有如此丰富的铜、锡资源，除了自用之外，必然用来交换，最先以短距离的以物易物一般产品交换，再过渡到商品贩卖，逐渐成

为较长途的贩运。正是通过这种经济交往，云南的铜才会远达中原。云南民族与中原华夏族远在三千多年就有这样经济联系，是令人惊讶的。

### 三、杜宇入蜀与庄跻入滇

在云南的北部是蜀民族的分布区，由于目前在云南发现的巴蜀文化遗物甚少，还很难说明云南民族与他们的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文化上联系。据《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汉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此外，《华阳国志·蜀志》也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之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朱提，即今昭通，杜宇便是云南人，从传说来看他曾任蜀王，由此不难看出早期云南民族与蜀民交流。

如果说杜宇入蜀带有传奇色彩和话，那么庄跻入滇至少在古今绝大部分历史学者眼中是真有其事的。战国时期，战国七雄都力争统一天下，最后逐步形成了秦、楚争霸的局面。公元前 316 年，秦国派司马错灭蜀，威胁着楚国的西南境，公元前 285 年，秦蜀守张若攻取了笮（今四川雅安一带），公元前 280 年秦又攻取了楚国的黔中地区（今湖南常德一带）。楚国为了稳固西南后方，便派大将庄跻沿长江而上，攻略巴（今重庆地区）出牂阿、夜郎，从今曲靖地区进入滇池区域。公元前 277 年，秦派蜀守攻取黔中郡，切断了庄跻返回楚国的退路，庄跻便留居滇池地区，变服从俗，称王，最后融合到滇人之中。庄跻之所以这样做，对庄跻及楚人而言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不这样就不可能统治当地民族；对当地民族而言，这些外来的楚

人他们放弃了自身的民族习俗，还可能放弃原来的语言，在当地娶妻生子，加入到当地民族的行列之中，当地民族把他们视为自己民族的一分子。庄跻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这是滇池地区较大的一次民族融合，促使滇池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云南民族 西南夷

### 第一节 云南政治、经济及民族发展概述

#### 一、政治概况

##### (一) 秦对云南的开发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 316 年秦惠文王采取司马错的建议,先灭蜀,后取巴,设置了巴郡、蜀郡、汉中郡,然后以巴蜀为据点着手开发“巴蜀徼外”。公元前 310 年时,分布在今天云南境内的两个部落群体——丹、犁,就开始接受秦的统治。公元前 285 年,秦蜀郡太守张若又“取笮及其江南地”,把秦的统治势力延伸到了今云南的宁蒗、丽江一带。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后,奋六世之余烈,在其前辈经营西南地区的基础上,派常頔修筑五尺道(由于道路仅宽五尺,所以叫五尺道),五尺道从夔道(今四川宜宾)南下,伸向了逶迤茫茫的乌蒙山,然后沿戈魁河而行,通过天险石门关进入朱提(今昭通)终于曲靖。由于五尺道的开通,使云南地区的各民族内地经济联系更加密切。

除修五尺道外,秦还在云南部分地区进行了直接的统治。《史记·西南夷列传》曾说:“秦时,……诸此国颇置吏焉。”尽管没有非常详尽的记载,但司马迁本人亲自到过云南,所以他的记录是可信的。秦始皇在云南开五尺道和置吏标志着中央

王朝对云南各民族正式统治的开始，为两汉在云南设立益州郡、永昌郡奠定了基础。

## （二）益州郡、永昌郡的设置。

汉朝建立后，经过文景之治，到了公元前 141 年汉武帝刘彻即位时，汉王朝的经济实力已经很强。史书记载说：“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汉武帝又重新开始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公元前 135 年，唐蒙出使南粤，在那儿吃到了四川产的枸酱，发现了从巴蜀经牂牁江有一条商道可通南越。于是，唐蒙便向汉武帝建议：招降夜郎，利用夜郎的力量，从水道出奇兵制服南越。汉武帝接受了唐蒙的建议，让唐蒙率军到夜郎地区，赠给夜郎首领大量财物，夜郎归顺。汉朝便在今四川南部和云南东北部与贵州连接处设置了犍为郡。之后，汉武帝又分别命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去开通南夷道（从今四川宜宾通往牂牁江的道路）和西夷道（从今成都到凉山州的道路）。由于耗费太多，加之又要对匈奴用兵，所以一度停止了对云南民族地区的开发。到了公元前 122 年，张骞自西域归来，说在大夏（今阿富汗）时见到蜀布、邛竹杖。这种蜀布、邛竹杖是蜀郡商人从今四川经云南运往身毒（今印度）而转卖到大夏的。大夏等国“多奇物”并且“慕中国”，但是由于“患匈奴隔其道”而不能和中国交往。所以张骞向汉武帝说，要通大夏，由西北的羌中危险多，又要受匈奴阻碍，而从蜀郡往身毒（今印度）转北，则路很直，又不受匈奴的威胁。于是，汉武帝便派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等人通过云南地区，寻求通向身毒的道路。派出的使臣虽然受到昆明族人的阻碍，但使臣们却把在

滇池地区见到的富饶情况向汉武帝报告，再一次加强了汉武帝开发云南为中心的西南民族地区的决心。

公元前 109 年，汉朝发动了巴蜀的军队击灭了滇东北的劳浸、靡莫（在今曲靖地区），滇池地区的滇王才投降，汉朝以其地设立了益州郡。公元一世纪初，东汉在西汉王朝经营“西南夷”地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向西汉未曾纳入统治的滇南、滇西南地区拓展。公元 51 年，哀牢首领贤栗派遣使者首次进谒越巂太守，表示愿意率本部落的万余人“内属”，东汉王朝封他为“君长”，并把益州郡所属的不韦（今保山东北）、嵩唐（今云龙县西部至保山县北部）、比苏（今云龙县西北部至泸水县）、叶榆（今大理、宾川）、邪龙（今巍山、南涧）、云南（今祥云）等六县从益州郡划出成立了“益州西部属国”。公元 69 年，哀牢王柳貌派他的儿子“内属”，代表着 77 个部落首领统治下的 55 万余人。汉明帝接受了这一请求，在他们居住的地方设立了哀牢（今保山南部、龙陵、德宏州）、博南（今永平县、临沧地区、思茅地区、西双版纳）两县，再加上益州西部都尉管的六个县，全部合并起来，设立了永昌郡。永昌郡的设立，不仅使哀牢等民族有更多的机会与内地人民交往，而且使云南各民族的交往联系更加密切，完成了今天云南西部、西南部边疆的全部统一。

### （三）特别的统治措施——羁縻政策

由于西南夷内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汉族地区不一致，民族的特殊性很突出，所以，便封西南夷各民族内部原有的首领担任王、侯，让他们保持住原来在本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按照旧的统治方式去统治本民族人民，而中央王朝派来的汉族官吏就通过这些土著的王、侯来对土著各民族进行统治，政治

上听从郡县官吏们的调度，经济上则象征性地贡纳一些地方特产。这种特别的统治措施被称为“羁縻政策”。它是汉族封建统治者对多民族而且发展又不平衡的地区施行的一种民族政策，这个政策的实质和意义都是很明显的：它在保持西南夷各族内部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其内部原来的首领进行统治，避免了不适应民族情况而产生的民族反抗。当然，这种民族政策只能在阶级分化已经产生的民族中才能有效施行。所以，《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独夜郎、滇受王印。”

## 二、经济发展概况

秦、西汉时期，云南各民族经过不断地实践，在滇池地区、滇东北、滇西的许多坝子中，经济有了大的发展。

滇池地区的滇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以种植稻谷为主，畜牧业也比较发达。在手工业方面，青铜器的冶炼铸造最具特色，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几千件青铜器来看，工艺方面的造诣达到了惊人的水平，有些还是世界上罕见的艺术珍品。因此，可以说秦、西汉时期，滇族的经济代表了当时云南的最高水平。

东汉时期，由于滇族的衰亡、迁徙，所以云南经济的重心移到滇东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仍然是稻作农业和青铜手工业。二千多年前滇东北的昭通坝子，地势低洼处积水盈尺，周回近百里，称为千顷池。《太平御览》卷 791 引《永昌郡传》说：“朱提郡（今昭通）在犍为（今四川省宜宾市）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水，燹名千顷池。”所以这儿有种植水稻的有利条件。王莽时期派驻朱提的地方官文齐，就在朱提修凿龙池灌溉稻田，把水田灌溉技术首先传

入滇东北地区。之后，文齐又在滇池地区开造稻田 200 0 余顷，于是就使这两个地区原来以种植旱谷为主的锄耕农业，转变为经营水稻为主的犁耕农业。牛耕技术、铁制农业也因之在这个时期大量传入云南。

由于先进技术的传入，农业有了大发展之后，也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代表是滇东北生产的青铜制品朱提堂狼洗。从现存的遗留文物看，滇东北的青铜手工业最盛时代约在公元一世纪中叶到公元二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假如将滇东北的青铜器和滇池地区的青铜器作一比较，表面上似乎工艺方面大为逊色，主要表现在人物动物附饰、镶嵌玉石图案消失，大部分是素面，即使有花纹也非常简单，这种不同主要是因为滇池地区的青铜器大多是贵族的专用品，所以极尽工巧；而滇东北地区的青铜器仅只是民间生活用品，只讲求实用，是成批生产，所以它的规格形制就大体一致。从这一点来看，表明滇东北的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较大的生产规模。

除青铜器外，滇东北地区的手工业还以生产“朱提银”著称于世。《后汉书·郡国传》犍为属国下注引《诸葛亮传》就提到“汉嘉金朱提银”。从史料和实物来看，朱提银在汉代被规定为全国通货，可见他的产量很高，又规定它的价值高于其它 2 产地的银 50%。可见其质量也是在全国之首。由于朱提银有名，到了后代朱提甚至成了白银的代名词。《聊斋志异·官梦弼》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女一日入舍中，及见断草丛丛，无隙地，渐入内室，坐埃尘中，暗觉有物堆积，蹴之连足，拾视皆见朱提。”总之，秦汉时期云南民族经济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但发展是不平衡的，主要是在滇池地区、滇东北地区发展快。